



刘
源
张

Liu Yuanzhang

刘源张

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专家。

1925年1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1949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1954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开创我国管理科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先河。创立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经国务院采纳在全国企业中推行,改变了国内企业对质量的看法和质量管理的做法。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引入设计、施工、建材的协调处理,并从管理学上开创劳动生产率的新研究。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我年青的时候

“文革”后,写我的文章有过不少。两三篇是应群众团体的要求自己写的回忆,多数是不同单位的记者采访我的记录。这次,中国工程院要我写篇自述,我已年过八十有一。人到了这般年纪,常常会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我更是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教育之德,同学的关怀之谊。借这个机会,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我的外祖母

我于1925年出生在山东省的青岛市。父

亲和母亲都出自中国封建式的大家庭。父亲那边是原籍山东的地主,母亲那边是原籍安徽的官僚。父亲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当了军阀时代山东省政府的官员。母亲从家乡出来,到济南来读师范。他们相遇,恋爱结婚,因为都是新派人士,约定脱离大家庭,组织小家庭,定居在青岛。于是,父亲开了家汽车行,母亲当了小学教师。父亲生性豁达,好交友,母亲柔弱处又有几分倔强。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长大的。

关于两边的老家,我都没有去过,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张家那边的亲人来青岛我家或长或短住过,我见过他们,才知道我有两个祖母,七个姑母。父亲是二房所生的三女一男中唯一的长男。前房的四个姑母都没受过多少教育,是地道的旧时妇女,二房的三个姑母都是大学毕业的新女性。我还知道了,父亲和母亲结婚之前有过一位妻子,生过两个儿子。那位妇人,早已亡故,这两个孩子也到青岛我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自己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一个伶俐的小表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吵吵闹闹、打打骂骂的环境中度过的。现在,我一看到人多,就头痛,大概是那时埋下的深层心理的影响。

这些人当中,我最亲的是外祖母。她离井背乡陪伴母亲出外求学,一路陪读,跟着到了青岛。我们三兄妹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而她特别疼我,我又特别喜欢她。躺在她的怀抱里,听她讲那些廿四孝的故事。夏天到了晚上在院子里乘凉,她教我认识北斗和天河,让我知道牛郎和织女是怎样离散又相会的。她做得一手好菜,我们都盼着过年过节,吃上她做的粉蒸肉、海带酥鱼那些南方口味的佳肴。每年她都腌上一坛雪里红,这时拿出来,配上点肉丝什么的,做出几样小菜,真是可口。外祖母识字知礼,善于操持家务。我们这个家,不管是人多时还是人少时,都算平平安安,虽不十分富裕,却也丰衣足食。这都多亏了她。

然而,我9岁快过年的时候,一场意外降临

了。外祖母离开老家时带出的一笔养老钱存在一家私人银行。这家银行的利息比较高,许多老百姓都把钱存在那里。一天传来消息,说银行老板携款逃跑了。她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了。银行在中山路的一个拐角上,看到大铁门紧闭着,好些妇女在捶打呼叫,有的坐到地上号啕大哭。这一幕场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犹如昨日一样,清清楚楚。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件事种下了我对不法商人和贪官污吏的仇恨。

父亲为了安慰外祖母,提出来要把我给她的当孙子。外祖母生有一个儿子,但是在9岁因病去世,所以她就成了无后之人。这在旧社会是天大的不幸,而且她那赖以养老的款项也失于一旦,更是雪上加霜。外祖母答应了,可是她家乡的族人不答应。祠堂派代表到青岛来,说不能过继外姓的人,要打官司。父亲说,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她老人家做孙子,一不要她老家的田,二不要她老家的钱,只望还她抚养我的恩情,让她老后有个依靠。这样说,又立了字据,才算完事。但是,最后族人还是把我的外祖母从祠堂除了名,从此不认她是刘家的人。这个打击对她说比丢钱还要大得多。不过,外祖母挺过来了。我想,在她的心目中,我才是她最大的指望。

转过年,我10岁了。在我就读的四方小学校,一天,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说:“从今天起,你改姓换名。给你起的名字是,刘源张。你要记住,中国的历史上有位大人物,他的名字是林则徐。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我没有考证过,林则徐是否也过继给外祖母,但我相信我那小学教务长赵老师的用意。他要我做一像林则徐那样的人。我感谢这位我小时的老师,他给我起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名字。多少年后,等我看到赵丹主演的影片《林则徐》,我发现,“制怒”这两个字也是我需要写出挂在墙上借以自省的匾额。

从这一行字开始,我改称我的外祖母为祖

母,祖母于1964年12月初在中关村我家病危。等我从吉林省梨树县团结公社房身屯大队第四生产队“四清”赶回时,祖母已经没有气力给我留下哪怕是只言片语了。她也许竟然完全不知我已侍奉在她的床前。哀哉!

我小时受的教育与我那个时代一般像我那家庭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私塾早已废除,上的是西式的学校。但母亲嫌它不足,一定要我每天背诵《古文观止》上的文和《唐诗三百首》里的诗。背不出来,不给饭吃。背过的那些文和诗,我已记不得多少了。但是,李密的《陈情表》中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两句好像是为我写的。

我16岁离开家乡,去异地留学。整整十五年让祖母为我担心挂念,而我却未尽到一分孝道。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已经做古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唐之曦。他是青岛的很有名气的外科医师,他有一个很有才气的名演员儿子,唐国强。他对我的祖母视同己亲,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简直成了我家的保健大夫。母亲给我的信中,每每提及此事此情,令我感激涕零。

二、国内的学习

小学的六年,我用了四年就读完了。那时有跳班的制度,我从二年级跳到四年级,又从四年级跳到六年级。我上的是当时青岛市四方的一所乡村学校。同学都是农村的孩子,城市的好像只我一个。我非常喜欢同他们一起玩耍,因为他们教给我一些我在城市街上见不到的玩法,甚至有个小朋友给我表演吃五毒的真把戏。母亲在那所小学当老师,每天带着我乘坐父亲开的汽车行跑那条路线的公交车往返市内与四方,她去教学,我去上学。我总是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一面看一面比画着开汽车。我对汽车的兴趣肯定是这时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来的,而正是兴趣对我日后的志向产生了影响。

初中的三年也没怎么费劲就读完了。我不是怎样刻苦学习课本的孩子,喜欢读闲书。家里有不少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

义》里的文臣武将和英雄好汉,《封神榜》、《蜀山剑侠传》、《火烧红莲寺》之类的妖魔鬼怪,无一不引起我的浮想。一天,我发现我家的阁楼上有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些线装书。翻开一看,算命的、画符的都有,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其他旧书。其中有本《马庄相法》,我把它的序读了一遍。大意是说,不是相法不准,而是相师往往看不到应该看到的地方,所以有时看相不准。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个联想、一个观察,成了后来我治学和做事的准则。

30 世纪的 30 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变、中华民族最多难的时代。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又侵入了华北,西安事变恰是我上初三时发生的。那时,中学有军训,教官都是原东北军的军人。他们常常在操场上向我们这帮学生讲述日本军队怎样打进来、他们怎样撤出来,声泪俱下,激起我们这些孩子要打日本的气概。

“抗日”是那个时代的吼声,“救国”是那个时代的心愿。我并不明白怎样去“抗日”,怎样去“救国”,但是知道要行动。青岛市中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公办中学,实行学生住校宿舍的制度。校址在青岛汇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在青岛驻军的军营,每个周末回家都要穿过中山公园,再路过日本人在鱼山路的一所中学的前面。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同行,经常遇到一些日本中学生,于是双方不管是哪方先挑起来,就互相扔石头、打起架来。其实,这更接近游戏,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滑稽。

到了高中,开始比较认真学习。读了一点书和杂志,知道了一点“科学救中国”的道理。正好家里有一位朋友,是从山东大学工学院毕业不久在青岛英美烟草公司任职的工程师,母亲托他给我补习数学。这位王工程师看我还可以,同时他还是独身,比较有空闲,就给我补习一些超出当时高中教材的内容。我看他年纪不大,就当上了工程师,生活很是舒适,心里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去当工程师。我自小无大志,

可笑这点向往也是别人榜样启发的。至于工程师是个什么样的职业,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怎样才能当上工程师,则是全然不知。有时偶尔问问这位工程师,他只是笑笑,不作详解。不过,我对工程师的关心,从那时起始终不断。对“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样当时流行口号的意义和它与工程师的关系是我后来一直探讨的课题。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1941 年 9 月,我进入在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从青岛考入燕大的只有赵经甫和我二人。他是我唯一的现在还保持着联系的国内大学同学。12 月日本对美国宣战,燕京大学随即被日本宪兵队关闭,我也就此结束了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活。短短的三个月,谈不上什么学业收获。留在记忆并值得一提的却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我认识了司徒雷登。他是燕大的校长,每届新生入学,他都要站在校园内他家的门口,与他们一一握手致意,我就是在那一天排队依次与他握的手。他是怎样的人,我当时并不知道,但他在给入学新生用中国话作了一场题为“我的人生观”的讲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洋人能用汉语作了那样一篇语言流畅、哲理高深的发言,已是匪夷所思,不但如此,而且给我的印象简直是位村老夫子模样。后来回国读到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又是一惊,怎么,司徒雷登竟是那样的人。直到 2005 年 5 月 15 日星期天,从中央电视台 9 频道的 Up Close 节目里看到对一位美籍华人将军 John Fuh 的采访。将军的父亲曾是司徒校长的秘书,两家过往甚密。根据他的说法,司徒雷登因为长期居住在中国,没有美国的社会保险,并且退休以后也没有从美国国务院领到退休金或任何补助,而是靠一家私人组织每月给他的 600 美元生活。他生活俭朴,全然不在意物质享受。这更是一惊。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另一件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自由的氛围。燕大当时对新入校的一年级学生不分文、理、工,进工科的只称工预,着重一般的教养课

程,培养良好的读书方法和健康的生活习惯。英语课根据入学考试分数的差异分成不同的高低班。我分到 A 班,从美国女老师那里受到严格的发音训练。上国语课的是郭绍虞老师,给我的作业是《战国策》的文字注释和训诂考证,锻炼了我欣赏古文的能力,上历史课听到穿中式大褂略显肥胖的齐思和老师用英语讲授现代史,开阔了我对历史的思路。这一些都使我感到新鲜。至于上物理课的实验实习,写实验报告,要求数据准确,文字工整,让我初步体会到了科学态度的意义。

再一件事是,1941 年 12 月 8 日的早上,日本宪兵队命令全校师生员工在 4 小时以内离开学校的情景。校园里一片忙乱,许多学生都在收拾行李,三三两两朝校门走去。我没有什么东西,一个柳条箱够装的了。看到一个俊俏女生手里抱着的皮毛大衣就有两件,行李散落一地,站在那里无可奈何的样子。我跑过去,帮她收拾,替她拿起,送她出了校门,又帮她雇了一辆大车,目送她上车向西直门方向渐渐离去。六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忘记。只是,匆忙之际,彼此连姓名也没问过一声。

经过这三个月的国内大学生活,我好像长大了一点。

三、国外的求学

1942 年 2 月,我去了日本。1950 年 12 月,我去了美国。为什么去,怎样去的,我在别处的文章里都写过。照着这篇“自述”的原意,我还是写些我要感谢的人和事。

第一个我要写的是绪方隆夫。初到日本在长崎上学的开始,住在一家农户家里。我住在楼下,房东夫妇房间的隔壁,楼上有四个日本学生,他是其中的一个。我和他怎样结识的,说起来有意思。

那时,我连日文的假名都差不多忘光了。读高中时,日语是必修课,但我抗拒学。到了日本,不学不行了。从学校的图书馆,凡是标题为文法的书我差不多都借出来,本着听说过的“读

书百遍、无师自通”的俗理,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每天必读一百页。懂不懂,不去管。书里讲的是文言文法,还是白活文法,也搞不清楚。反正,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不到一个月,竟然把十几本文法书读完了。日文中有许多汉字,中间用一些日文假名连接起来,构成一句或一篇文章。看到的文章,有些全是汉字,但又不像汉文。不管怎的,总之,我对日文的样子,心里有点数了。一天要给在青岛的学费资助人、一位日本人企业家写信报平安,因为有了这点底子,就开始用日文写了起来。忽然,绪方敲门进来,看见我摊在桌上的信稿,喊叫了一声。好像是说我一句日常用语都不会说,怎么能用候文体的日本古文写信。其实,我根本不知写的是什么文体,只知这样的写法,汉字多些,好写一点。从这一刻起,他成了我的个人专用的日语老师。他教得很认真,我每说一句,他都耐心地指出错在哪里,该怎样说。我想说又不会说的,去问他,他都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上的是为留学生开设的预科班,学的是相当于日本中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的课程,他是本科二年级,年纪比我大两岁,个头却比我稍小一点。学业上差得太远,没有什么共通语言。还有一次,他冷不丁地问我,知道马克思吗。我摇了摇头,他再也没有跟我谈什么了。其他的,我们无话不谈。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议论过政治和中日关系的事。虽然我那时和几个伪满来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轮读《孙中山全集》和老一辈人士,如章太炎,来日本作过的讲演稿,但这些属于我们内部的事和话。我和他之间的谈话,总是他说的多,我说的少。而且,他好像把我当作他的知音,什么话都愿跟我聊。一个晚上,他跑到我的房间来,一屁股坐下,满脸沮丧,对我说他被人强奸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新换搬来下宿的一家,男的当兵打仗去了,剩下的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开了这家下宿店。一天,女主人提出一家去洗温泉,要

绪方一道去。绪方要拉着我一同去,她不答应,我也干脆顺水推舟劝绪方一人去。他们去了,绪方说,那天夜里他正睡得蒙眬,感到有人压在他身上,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幕。他越说越有气,我能理解,因为这位下宿家的女主人是我见过的妇人当中最丑的女人,我从没见过那样的丑女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出战争造成的悲喜剧。还有几出,与绪方无关,我不想写了。

他喜欢爬山。每个周末,他都带着我去爬山。长崎周边的山几乎我们都去爬过。我也喜欢去,爬上山,俯瞰山下的港湾和船只,不由想起青岛的山和海。孰料,两年后,这倒成了长崎宪兵队抓了我去审问的一条原因。他的兴趣很广泛,哲学和宗教是他关心的话题。我对哲学一无所知,但对宗教却有所接触。小时家里,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还有天主教的,常常是父亲请到家来的客人。父亲开玩笑地对我说过,咱们谁也不得罪,都信。祖母自从遭了劫难,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我每个星期天都陪她去教堂。母亲的一位好友是位佛教徒,常送些佛经来,要我读。因此,和绪方谈宗教,我还有些本钱。他常去学坐禅,也拉着我去。这时,我真犯愁,因为我盘不好腿。心想这也是一种锻炼,就跟着他去了。应该说,我跟他的交友,丰富多彩。

绪方是日本熊本县一户农家的独子。一年夏天,他领着我去他的老家,一路上给我讲解当地的史迹,显出自豪的样子。熊本是个大县,日本的封建时代这里是一位大诸侯的领地。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后,熊本出身的志士仁人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西乡隆盛这位传奇式的大人物。他怎样协助建立明治新政府,怎样由于意见对立而起兵反抗新政,又怎样被剿灭在熊本的山地,绪方一一给我讲得眉飞色舞。最后带我去西乡剖腹自杀的遗迹凭吊,这时他意气消沉,悲哀异常。真是个性情中人。他给我讲日本的历史,当然使我受益不浅,但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给我的活命粮食。1942年开始日

本全国实行定量供应,我吃不饱,有时饿得要哭。他每次逢年过节,回家省亲后返校,必定给我带回满满一小皮箱的日式米糕。用火一烤,香喷喷,既充饥,又好吃。在长崎的那三年,全靠它撑过来。

1944年6月的一个夜晚,长崎宪兵队突然把我从下宿处抓进了监狱,逼问我充当中国共产党特务的种种行径。我哪里是共产党。小时听说有个朱毛,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都不清楚。一次审讯时,宪兵让我在过道上碰见绪方,接下来告诉我,他也在隔壁房间里受审。我只听见隔壁有噼里啪啦打人的声音。12月底,宪兵说先放你回去过年吧。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一看,桌子上摆着一张明信片,是绪方写的,说他应召入伍了。临行前祝我好运,留下了他的部队番号。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报纸每天都刊登日本军人复员的消息。一天,我发现报上登出来,这个番号的部队在乘船开往太平洋上的某一岛屿时被美军潜艇击沉。绪方想必长眠在太平洋的海底了。2004年11月22日,在我离开长崎60年后,我又回到了长崎大学。目的之一是确认他的下落。在名为琼林会的同学会办公室,我查到了在毕业生名簿上他的名字列在战死者的一栏。他不过才21岁。

第二个我要写的是位美国女士,Dr. Elizabeth Huff。我去美国之前,在日本京都,遇到从英国来日本进修的大英博物馆东方艺术部主任 Dr. Peter Swan。他临时住在我寄宿的中国古代史专家贝塚茂树教授的家里。交谈中,当他知道我想去美国读书,就给我写了一封给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 Prof Hans Frankel 的介绍信,要我带上。1951年的春末,为了换个工打,去访问了 Frankel 教授。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介绍我去见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就是这位 Dr. Huff。见到她,我夸说了一番话,精通中、日两国文字和语言,对图书馆的工作肯定有用,等等。她说好,先做一个小小的考试吧。于是,她问我知道 radical

吗。心想,这个字作为名词是数学上的根数,作为形容词有激进的意思,她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说出了我的疑虑。她笑了,说这个字就是你们汉字字典的部首。我一听,马上说,部首没有问题,我全知道。她再问,那么,字典上一共多少个部首。我真不知道,鼓足了勇气说,大概一百多个吧。她接着问,那你说第 75 号部首是什么。我愣住了,她解释说,为了使美国学生易学中文,把汉字部首编号了。这一下我急了,三问三不知;图书馆这份打工拿不到可是关乎我学习和生活的大问题。我大着胆子对她说,馆长先生,请你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回去背熟了部首,明天再来应试。她又笑了,说:有你这句话,从现在起你是本馆的职工了。这一幕,我写不好。但是,我的焦急,她的幽默,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一肚子感激。

处得时间长了,我了解到,1941 年她正在燕京大学,从日本宪兵队封校的那天起,她就成了俘虏,被关进了设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太巧!我父亲的老家就是潍县,1941 年我也在燕大。世界真小。这时她已经是位中年妇女,年轻时一定很漂亮。良好的教育加上东方的经历使得她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但是,她又是保守得很。一直独身,又从来不开汽车。上下班全是和大学图书馆的另一位女士一同步行。图书馆里从副馆长到一般馆员好像都怕她,我对她只有尊敬,没有惧怕。有了那场交锋,我在东亚图书馆的工作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尽管一周去两天,而又多半安排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一向按时稍微提前一点时间上班、稍微拖后一点下班。这个东亚图书馆有单独自己的小楼,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环境。这里的书香,这里的人情,我的怀念。

开始的工作是排图书卡片,按照文献标题第一个字的部首号码排好,装进卡片盒。这时,我明白了她出那些考试题的意思。因为我真下功夫把汉字部首硬是记熟了,排起来很快。一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我聚精会神在一个大

桌子上摊开卡片,一张一张地排着。稍微喘息一下,回头一看,她站在那里,我竟然一点没有发觉。原来她观察我的工作情况有小一段时间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她给换了好几种工作。在地下室排卡片,再到在大厅坐台服务,又回到地下室整理古籍善本。每种工作都是新的学习,新的收获,而又是常新的回忆。

我在东亚图书馆的最后一种工作要大书特书。Dr. Huff 领我到这间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的地下室房间,对我说,这里全是大学投巨资从中国引进的各种资料,极为贵重,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们一一记录,作成卡片。说完后,她把房间的钥匙交给了我。以后,我在这房间工作的时候,她从没有进来过。在这房间,越干越惊。王羲之的《兰亭序》各个时代各种拓版一些书籍的孤本善本等,不胜枚举。《三国志评话》等著名小说的平话本我在这里初次看到;秦砖汉瓦也是看到了拓片才认得了它们的面目。伪满时代作过教育部长的江亢虎的藏书全被搜罗到了这里。忽然想到,这里的东拿出几件,岂不能卖不少钱,我对 Dr. Huff 给我的信任,感激益深。她对我很亲切,见到我总是有点微笑。我想,大概那天初次见到她时我的拼命给她留下了印象。

1982 年夏,相隔卅年,我再次访问了伯克利分校,到东亚图书馆看了看,知道 Dr. Huff 已经去世。详情没有打听,只有馆里的旧知告诉我,为了争夺馆长的位置,那位副馆长因为没有争到而开枪自杀了。Prof. Frankel 也转到耶鲁大学去了。顺便提一下,他的夫人是张充和。他们处处给我很好的照顾,一年冬天,他们让我住到他们在山腰上新建的住宅。充和女士是东亚图书馆的正式馆员,我从图书卡片上经常看到她的字迹,很是佩服她的书法。回国以后,从报刊上才知道,她原是江南苏州的世家,大有名气的张家三姐妹的大姐。沈从文的夫人是她的妹妹。我本应该早早多多向她请教的。

除了认识了这几位可爱的人,我在东

亚图书馆打临工期间的收获受益可真是不少。这个图书馆和我在那里的工作对我攻读的专业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因坐台服务,我有机会认识了许多到东亚图书馆阅览书报的美国学生,还有老师。坐台服务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听电话,转拨给有关的人;另一个是向读者提供咨询,帮他们查找需要的图书资料。在那期间结识的人当中,有两位该写写。一位是陈世襄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在伯克利分校教中国文学的副教授,一个人住在一栋相当破旧的小楼里,有时要我去他那里聊天。我只觉得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学者,别的也没注意,我的中国文学修养远远没有能和他对话的水平,只是他打电话来要查查什么文献,我就老老实实给他去查,再送去他要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我热衷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天龙八部》的后记关于陈教授的往事记载,知道他在大约是1978年去世了。另一位是 Al Dien,当时是学习中国史的研究生,日后成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和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我同他比较熟,改革开放以后才又重温友情。一年他写信给我,要我去他那里作一年的研究工作,并且附上一言,说“你若不来,等我无职无权,想请你时就办不到了”。那时太忙,没有去,现在想起,有点后悔。他的夫人是长在台湾的名门小姐,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丁爱国。我问他爱的是哪个国家,他说美国中国两个都爱。其实来图书馆的大都是研究生,美国的、欧洲的都有,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背景,跟他们搞熟了,他们有时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通过这些活动,我对当时美国的社会和知识分子有了较一般中国留学生为多的认识。这是我去打临工的当初没有想到的事情。

关于 Dr. Huff,我了解的不是太多,但她的言谈举止,特别是对我的教导和关怀,我记在心里好多年,今天写出来,作为对她的纪念。

四、生活、恋情、恩情

在国外的十五年,是我从17岁到31岁的

一段人生。特别在日本是我的青春年月。年轻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恋情,我也有我的故事。

日本的战后,至少就我处身目击的那段时间看,社会极度不安动荡,人们经历着思想上的混乱和生活上的困苦。年青的男女尤其渴望爱情。而且,原来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被战后的“自由和民主”的宣传打掉了,爱情有了种种的表现,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奔放。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日本姑娘,悦子。

她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抚顺,小时在北京住过。比我小三岁,是个美丽的姑娘。她会说中国话,听得出是北京的口音。日本投降后的1948年,她们一家八口从北京回到了东京。她很少跟我说起她的身世,我每次说要去问候她的父母,她总是不太情愿。后来,她还是同意带我到她在中野区阿佐谷的家,见到了他们。各住一屋、互不讲话。不知是何缘故。难怪,在她的脸上我有时看到一种略带哀愁的神情。1988年她从日本给我寄来了一本她大姐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书的最后一章我才了解到了实情。

看电影、滑冰、跳舞,这些年青恋人们常有的活动,我们也有。但最愿意去的地方是武藏野的一个高岗上的草地。我们并肩躺在那里,一声不语,凝望着蓝天白云,好像我们与这天地融为一体了。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一直在自修法语,去四谷的法兰西学院上夜校。我也去报了名,每次上完课,我送她回家。从四谷乘地铁,坐中央线要走半个多小时。在车上也是没有多少话。这就是我的初恋。

母亲给我来信,说绝不许我娶日本人,还加上一句,这也是祖母的意思。可是,我每次给悦子打电话,出来接电话的她家老佣人、姓厚见的大娘、总是对我说,悦子小姐等着你呢。结婚的话,我没说;不结婚的话,我也没说。只有我在上船去美国的前一天,我到她家辞行。她留我住在她家,那是一所大房子。她的房间在楼上

的一角,我睡在另外一间客房。半夜,她溜进我的被窝,偎依着我低声哭泣了。

1981年整整一年,我应联合国地域发展中心的邀请,在日本的名古屋做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同妻子一道住在租来的一所公寓房里。一天,忽然接到一个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是悦子看到《朝日新闻》上登出的我来到了日本的消息,说一定要来看我。我说,我去吧。借出差的机会,我乘新干线去了东京,在住宿的赤坂东急饭店见到了她。她还是那样美丽,穿着一身极为合体颇为讲究的西装。日本的饭店一般房间都很小,我的出差旅费住不起套间。我还是和她并排着躺在了床上,听她诉说那别后的日日夜夜。这些年她陪着大姐到处跑,北美西欧都去了,还到过卓别林在瑞士的家中做过客。她已经结婚了,嫁给一位本人是艺术家的中学校长。然而,她患上了乳腺癌,胸部切除了一大块,并且影响到左手的活动。晚上我请她在饭店下面的餐馆吃日式火锅,侍者伺在一旁老是问,太太还要点什么吗。吃完了,她叹气说了一句,我若是你的太太,那有多好。

临别时,她送我了一盒磁带,是当时很有特色的歌星五轮真弓的专辑,回到北京的家中,听到那第一首歌的第一句词,是“突然,你回来了”。听着,听着,反复听着,我止不住泪水。以后的几年,我每次去日本,都约她出来见见,我们一同再去到那些我们年青时去过的地方。一次,我特意住到神田的一家小旅店,为的是那个街区的一个小公园。1949年的冬天,我认识她

快一年了。刚下了一场大雪,我在宿舍等她来,在大门口,看见她从小公园的雪地里急急忙忙小跑过来,穿着一件白大衣,一双黑皮鞋,那样子太美了。那天,她与我谈歌德,问我有没有过少年维特式的烦恼。

1992年,我到东京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见到了她。她提出来,今后不要再见了。我理解。她同丈夫的关系怎样,我没问过。她没有孩子,养了几只猫伴她过日子。每次见她,总觉得她有些郁闷。回忆只能增加痛苦,如再亲身去走走回忆中的道路和地方,更是痛苦。十年里,她给我写过许多信,都是痛苦的回忆。那以后,面也没见,信也没有了。2004年的11月,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日本遍历过我年青时到过的城市,唯独东京我没有去。

我的青春,纯真的青春,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去东京重会悦子,给妻子落下了埋怨。怪我为什么一个人偷偷去,请到名古屋的家中来,岂不更好。是啊!但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和情,还是留给我们两个人自己吧。现在把它写出来,我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呢。

如今,我们都老了。我们认识的人也都老了。年青时的爱情、恋情、友情都已成了恩情。我每天都在感恩,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弟妹给了我童年、师长给了我关怀、学友给了我温暖、妻子给了我爱顾、女儿给了我欢乐,走在人生路上的男男女女给了我色彩。当然,感谢悦子给了我青春。